



海国图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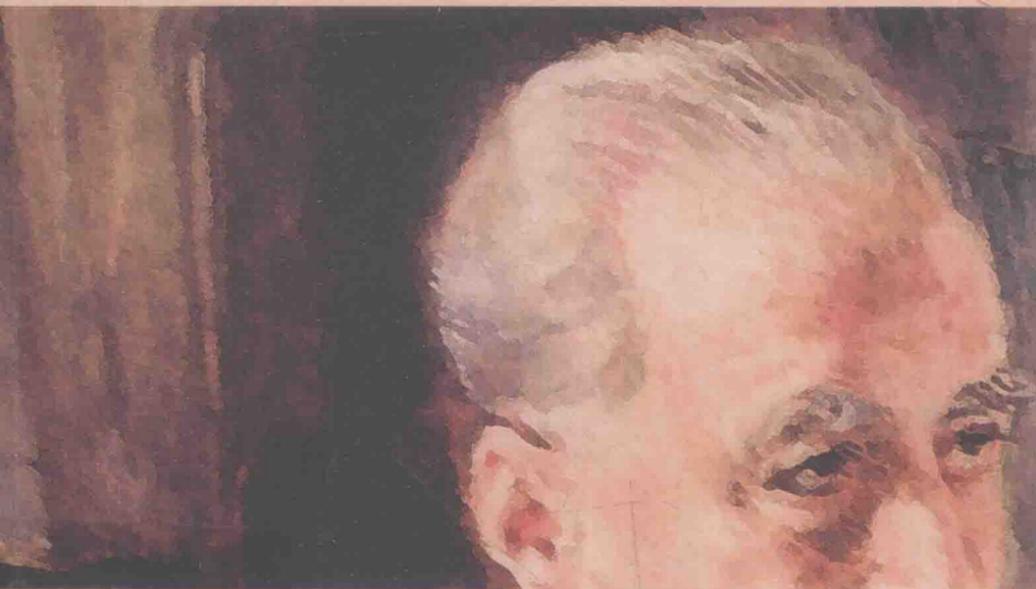
西南大学海国图志书院主办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协办

德性与权力

摩根索论文集

[美] 汉斯·摩根索 著 董成龙 编校 董成龙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海国图志

西南大学海国图志书院主办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协办

德性与权力

摩根索论文集

[美] 汉斯·摩根索 著 董成龙 编校 董成龙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性与权力——摩根索论文集 / (美) 摩根索著; 董成龙编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12

(海国图志丛书)

ISBN 978-7-5426-5405-2

I. ① 德… II. ① 摩… ② 董… III. ① 摩根索, H. (1904~1980) —国际政治—研究—文集 IV. ① D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1783号

Virtue and Power: Selected Collections of Hans Morgenthau

Ed. by Dong Chenlong

Copyright © 2015 by Susanna Morgenthau & Matthew T. Morgenthau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Limpid Stream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 者 / [美] 汉斯·摩根索

编 译 者 / 董成龙等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陈马东方月

特约编辑 / 马健荣

装帧设计 / 王小阳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周广宏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江苏常熟市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32千字

印 张 / 9.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405-2/D·305

定 价 / 38.00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0512-52381075

目 录

编者说明·····	1
上编 现实主义与德性问题·····	5
教育与世界政治····· 董成龙 译	7
政治的恶与恶的伦理学····· 董成龙 译	25
自由的诸多困境····· 龚世琳 译	51
现代科学与政治权力····· 董成龙 译	65
科学诸限度与社会规划问题····· 叶 然 译	93
缅怀阿伦特····· 董成龙 译	113
马基雅维利的乌托邦····· 董成龙 译	119
下编 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125
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一份资产负债表····· 宋建含 译	127
美国的社会危机：享受现状····· 马 源 译	159
美国权力的病理学····· 董成龙 译	179
国家利益的评价标准····· 何晴倩 译	197
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董成龙 译	209

另一场大辩论：美国的国家利益	谭 星 译	219
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源	张 雄 译	251
美国与中国	张 雄 译	257
通往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实定道路	谭 星 译	269
人名索引		281
事项索引		293

编者说明

在华夏大地，摩根索的出场往往定格在国际关系学界的舞台上。而且，每每上台，剧院总让他带着“现实主义六原则”的面具登场。但翻阅整部《国家间政治》即可发现，那只是他的冰山一角。只需整理他的作品清单，便可抹去那张以偏概全的面具。

与摩根索同时代前往美国的犹太难民还有施特劳斯、阿伦特、基辛格等重要政治学人。这些学人已经成为汉语学界的“关键词”，与之相比，摩根索却受冷落的多。这或许与汉语国际关系学界的大背景相关。汉语国际关系学界起步较晚，却非常注重所谓“专业性”，要求师生一头扎进当代西方国际关系专家的著作，但忽略了理论和历史的培育。这也就导致一个后果，所谓“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可能熟知约瑟夫·奈这个政学两栖的高手是“软权力”的概念发明人，却漠视他在书中明确提示培根的“知识即力量”(Knowledge is Power)是其思想来源。他们还可能熟记马基雅维利是个两面三刀的现实主义大师，却不去思考，在意大利四分五裂的时代，渴求国家统一的想法是多么浪漫！他们更可能背熟了“冷战”打头的各种双边关系、世界格局特点，却不去查找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的惊世判断——在《民主在美国》上卷的结尾处，通篇没有提及俄国的托克维尔，突然不加证明地指出，未来的世界将由美俄两个国家一分为二地统治。

有趣的是,纵然约瑟夫·奈自承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百读不厌,吉尔平坦言古今政治几无差异,政治哲学和古典政治史在汉语国际关系学界仍缺乏正当地位。¹要知道,约瑟夫·奈、吉尔平等人当然重要,但若只是乖乖阅读他们的作品,永远只能是他们的好学生,无法与之平等对话。其实,与他们的著作相比,他们的阅读提示更重要——汉语国际关系学界亟需大量阅读、研习欧美国际关系学者所阅读的作品,涵咏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政治哲学和古典政治史,这才是汉语国际关系学界的出路所在。

若要仿照欧美学人治学政法学问的路子从头学习国际关系,摩根索是一个好的起点。他老早就注意到美国的政治文明(political civilization)问题;美国的双重身份问题——作为世界主宰民族的美国和作为具体国家利益实体的美国;还有德性与权力、真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不一而足。

此次编译这本文集,着重安排了摩根索围绕政治哲学和美国政治-外交基本理念的文章,以及基于基本理念爬梳而阐发的时局评点,他关于具体双边或多边关系的更多文章不再此列。我们无意以这样一本小册子提供摩根索的全貌,只希望让汉语学人更多关注像国际关系这类政法学科的基础命题。

摩根索曾在1970年出版文集《真理与权力》(*Truth and Power*),本书名曰“德性与权力”,一方面是对该书的呼应,另一方面也基本概括了本文集所收录文章的核心问题。为方便读者阅读,译者在必要处以“译者注”的形式对文中若干内容作出说明,凡不加注明的注释均系作者原注。

本书成稿后,由我统校全书,龚世琳协助处理了若干疑难语句。2007-2008年间,我发愿要编选一本摩根索的文集,幸也不幸的是,近

十年过去了,这一想法仍不“过时”。

董成龙 2015年初秋于京师

注释

1. 虽然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院或国际政治系都会开设“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这类课程,但从院系的师资力量、教学计划和课题指引来看,政治哲学与古典政治史的课程处于边缘地位,毕业论文设计若以相关论题展开,则会被质疑丧失学科专业性。据说,有的战略学专家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只有精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这只是不具普遍涵盖力的个案。

上编 现实主义与德性问题

教育与世界政治¹

董成龙 译

对政治教育的健全思考必须从以下两个命题开始。第一,存在一个真理,不管它看起来多么晦暗不实,它都普遍适用于古往今来的所有人,而教育的任务就是传播它;第二,专业教育是传播真理的媒介之一,但它未必是最有效的那个。然而,这两个命题都没有在我们的文化中得到认真对待。

如果说我们的主流文化趋势并没有否认在政务(matters political)中存在客观普遍真理,那最起码它也是在否定人类获得理性的可能。政界观察者被要求只看他想看到或习惯看到的事。而且,他所能看到的不过是各种社会力量一朝一夕的离合,并不具超越时局的意义。这样的政治概念和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天然后果:教育的过程压倒了所讲授的真正的真理,调查的方法论胜过了调查本身,对实践的关切盖过了理论关切。既然意识不到客观普遍真理,那么也就没有真理可教;既然政治世界被视作昙花一现的社会力量的彼此互动,那么教育事业也就沦为学习如何辨识这些力量,以及如何避免陷入各种力量的互动之中。这样一来,政治教育就沦为技术的、描述性的、方法论的和改良的事业,美国的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学就是例子。

美国政治科学的实用性

美国政治科学得以存在的最大动力是实用性。它从两个源头汲取养分,其中一个源头和所有地方的现代政治科学无异,另一个则是独属于自己的。

政治科学之所以能成为遍及西方世界的一门学科,端赖于主导西方思想的哲学系统在 19 世纪初最后绽放后的崩溃,还在于伴随其中的对社会环境实证调查的发展。在形而上学体系中,社会环境首先是形上思辨和道德假设的主题,西方思想从形而上学体系中解放出来,就催生了所有的社会科学。在某些领域,譬如经济学,这种解放要来得早些;在其他一些领域,譬如政治科学,这种解放就来得稍晚些。

因为西方思想在 19 世纪下半叶发展出一种反对思辨的实证倾向,可以说,它只能在美国精神的性向中找到一个现成的天然呼应。虽然欧洲政治思想在反对形而上学的同时继续关注理论,美国政治科学却被这个新学科的现实承诺给压倒了。美国在 1980 年代建立第一批政治科学系,并不是为了理论解读(遑论哲学思辨),当时主要是为了应对实际的紧急情况。美国政治科学的历史多半由一种实用取向主导。

因为美国政治科学的实用精神就是要满足实践所提出的千变万化的要求,所以,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它都没有理论的统一性。权且从我最熟悉的两所政治科学系中随机挑选几门课程来看,“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及其形而上学基础”和“保守的政治学”,“组织与管理的一般原则”和“国际法”,“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行为”和“法学导论”,“民族主义”和“政治行为与公共政策”有什么共同之处,“俄国政治经济制度”和“公共人事管理”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把这些课程松散地联系

在一起的公分母是一个泛泛的、模糊的坐标，它指向国家的本性和行动，以及那些反过来对国家有直接影响的行动。

区分哪些值得理智认知，哪些对实践有用，这是任何真科学的发展前提，而政治科学尚不具备这种区分能力。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几十年前就完成了这种区分，那时候，商学院(schools of business)、家政学院(schools of home economics)、零售学院(schools of retailing)、社会工作学院(schools of social work)和其他类似的学院接掌现实关切，这种关切充其量能为理论知识找到实际用处，抑或只是与这种知识保持最脆弱的联系。人们仍然公认，政府过程的发展不仅是政治科学家值得参与的事，还是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当要素(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正当要素)，它可以在政治科学大纲中任何一门课程的标题下讲授。

美国政治科学主要致力于自由主义改革的现实目标。在这些目标中，每个目标方向下的主要成就，都期望使社会更接近于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学的永恒问题(譬如不平等、不安全、冲突、暴力、权力本身)，可是它们什么也没做到。旧问题以新面貌出现，让科学的炫耀和自由主义政治科学的末世论期望破灭，昨日的期望和今日的成就最后只是明日的幻想。自由主义政治遭受了经验的一连串打击，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它对改革的幻灭和创新性思维与行动的衰落。自由主义政治科学的宏大改良方案在渐进发展中逐渐消失；不要指望这种发展能带来什么伟大的事儿。

“国际关系”的大杂烩

作为一门学科，国际关系学与政治科学有着类似的发展和性质。一战后，国际关系研究被视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主要有三个学术志趣：历史、国际法和政治改革。1919年，威尔士大学设立了国际政治

讲席,前两任讲席教授齐默恩和韦伯斯特都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这并非偶然。当然,历史知识尤其是外交史知识,是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虽然国际关系学的学生必须有周密的历史知识,但他们的学术志趣与历史学家不同,下文会谈到这一点。

显然,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志趣是立足现在和未来,而不是过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学术志趣则是关于国际法的。国际关系学被视作向两个层面发展,一个是法律层面,提供国家应该遵守的规则;一个是实证层面,从国际法规的角度说明国家实际做出的行为。因此,通史、外交史和国际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三大支柱。

国际关系研究的第四大支柱不容易发现。“渴望更好的世界”构成了这一支柱,这些渴望本身在道德上值得尊重,但它们被含混地认知,并被等同于任何流行于一时的补救措施。因此,我们发现:学术志趣始终随着舆论导向而变,今天关注裁军,明天关注仲裁,后天就关注国联或联合国,大后天又关注集体安全了。

杂糅众学科中的碎片知识就弥补了这四大支柱间的裂缝,而这些知识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超越了任何特定国家的界限。芒图教授很好地总结了1935年国际智识合作社的会议共识:

人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在任何现象前加上“国际”一词,因为它属于所有国家。因此,人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就都成了国际性的了。这样一来,晕船就是一个国际事件;人们在所有海洋上都会经历晕船,不仅如此,各个社会都在与这种病作抗争,人们可以想象一个国际联盟,它旨在研究和比较这种疾病的不同治疗方法。

我们不应该遗漏：这样建起来的学术领域的智识同一性必定具有最肤浅的性质，凡是在众多学科之间有真正整合与交流的地方，荣誉也应该归入杰出学者心中的创意过程，而非这一领域的学术组织。

“区域研究”

经过必要的修正(*mutatis mutandis*)，区域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与国际关系学要处理的问题一样：迄今为止，它们都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核心问题需要再次聚焦。二战期间，要在人力上为海外服役做准备的实际需要，造就了当今流行的区域研究类型。有可能在海外担任要职的人，必须尽可能快地熟悉那些国家的语言、地理、文化和历史。这些培训课程不仅达到了它们的直接目的，还放弃了以传统学术的方式聚焦一个外国区域，可以说，它们将所有学科的方法都用在区域本身的特色与问题上，以这种方式聚焦这一区域。完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一般被称作“整合”，而这一过程对研究者心智的影响可以说是“跨学科的”。

如果从一个更高的智力层次来看，现实需要仍然为开展区域研究提供了一个主要依据；这些需要显然还影响了对高频研究区域的筛选。俄国和亚洲就在争夺研究者的关注和各种资源的承诺。不过，就美国外交政策重点关注的那些区域而言，关于它们的知识是碎片化的，可为政府服务的专家严重地供不应求，这并非偶然。区域研究中的核心地区，一般都被界定为与政治利益的领域相符，这也非偶然。因为，最具政治意义的区域似乎已经得到了充分覆盖，大学的新晋管理层在搜寻地图中的空地，他们要在那里建立区域研究所。

与区域研究(一般是在理论上，有时在实践上)有关的学术目标有三个。其一位于理论和实践的边缘，其二来自社会科学的视角，其三

来自人文学科。区域研究旨在传递文化相对性(cultural relativity)的经验,这会让我们在理智判断、道德评判和审美中公允地对待外国文化,同时还会让我们有效地应对外国区域,换言之,用当地人的方式,而不是把我们的文化强加于人。再者,区域研究应该为一种普世社会科学(universal social science)的发展做贡献,这样一种科学来自于对不同文化中相似现象的剥离、分析和比较。最后,区域研究应该提供智性和审美上的满足,而这种满足源自对各种文化表现的认知。

显然,同时为所有这些目标设定同样的假设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实际上,在区域的限定与筛选上,与具体研究项目的发展一样,实践的考量一般胜过纯粹智性的考量。

政治科学的哲学基础

这样一来,一种关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政治科学既要公允地对待其科学的伪装,又要公允地对待其主题,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在涉及到政治科学的科学伪装之处,问题的答案来自三个基本命题:政治哲学对政治科学的重要性,政治理论与政治科学的一致,政治科学围绕政治事务交流客观普遍真理的能力。

与所有科学一样,在视角与方法的一般概念、特殊概念和运行中,政治科学大多在隐秘地沉思某些哲学命题。甚至最反对哲思的政治科学,也奠基于对人与社会的本性和科学本身的哲学式理解。这种理解是哲学式的,其有效性并不在于它可以经验证实(虽然它可以经验证实),而在于它与呈现现实真正本性的某些一般命题逻辑一致。政治科学既不需要证明这些命题的哲学有效性,也不需要证伪它,但它必须假定有些命题是错误的,而有些命题是有效的。这些哲学假设的